



中山大學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工作簡報

第三十五期

二零一六年十月編印

目 录

中心动态

- 徐长福主任率研究中心成员参加雅典
“世界哲学大会——亚里士多德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
 - 中心成员练建玲荣获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立项2
 - 中心邀请郭文亮教授举行纪念“文革”50周年学术报告会2
-

学术活动

- “逸仙实践哲学讲坛”第8期综述3
 -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2期综述10
-

学术成果

- 中心主任徐长福在《基督教思想评论》上发表论文18
- 中心成员杨玉昌成果简讯19
- 中心成员王兴赛成果简讯20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

邮编 510275

本期责任编辑/校对

刘晓雷/叶仲宇、叶甲斌

◆中心动态◆

徐长福主任率研究中心成员参加雅典 “世界哲学大会——亚里士多德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为纪念亚里士多德诞辰 2400 年，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和希腊哲学学会于 7 月 9—15 日在希腊雅典联合举办了“世界哲学大会——亚里士多德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25 名哲学家出席会议。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率研究中心成员马万东、徐苇杭出席会议并分别宣读了研讨论文。

此次会议采取了论文提要遴选、正式邀请、注册参会等国际会议通行流程，面向全球学者征集论文，总计有 428 篇论文入选并获邀参会。大会主会场设于雅典国立卡波蒂斯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方还分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院遗址和普尼克斯山举办了主题演讲，并于雅典卫城旁的阿提卡斯剧场举办了音乐会，让与会者充分领略了“西方哲学故乡”的风范。研讨会主要采用了“全体会议”、“圆桌会议”和“分组会议”三种形式，并设有“亚里士多德与前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亚里士多德形上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和逻辑哲学”、“亚里士多德方法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心智哲学和心理哲学”等若干专题。其中徐长福主任的“四谓词还是二谓词：亚里士多德述谓理论的一种批判性重建”、马万东的“功能论证：一种新辩护”和徐苇杭的“哪种灵魂状态更具道德价值：和谐的抑或冲突的？”3 篇论文入选分组会议，应邀赴希腊雅典共襄盛会。

在徐长福教授的带领下，此次雅典的学术之旅顺利而卓有成效，为后续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努力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又一次自觉追求，也是长期注重从西方哲学源头进行学术训练的自然结果。

（马万东）

中心成员练建玲荣获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立项

中心成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练建玲，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思想比较研究——以二者通信（1879-1932）为中心的考察》为题，获得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立项。项目批准号为：16YJC720011，经费共8万元。该课题借助于新近出版的德文版《伯恩斯坦与考茨基通信集》（四卷本），对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从1879年至1932年间的所有通信进行系统分析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思想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练建玲）

中心邀请郭文亮教授举行纪念“文革”50周年学术报告会

2016年5月16日，中心邀请郭文亮教授举行纪念“文革”50周年学术报告会，报告题目为“‘文革’50年祭：怎样理性认识和研究‘文革’？”。详情请见《“‘文革’50年祭：怎样理性认识和研究‘文革’？”专题简报》

（刘晓雷）

◆学术活动◆

“逸仙实践哲学讲坛”第8期综述

“逸仙实践哲学讲坛”第8期于2016年5月22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211课室举行，本期讲坛题目为“集体记忆与集体回忆(Collective Memory and Collective Recollection)”，由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德米特里·尼库林(Dmitri Nikulin)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徐长福教授主持、马天俊教授评论、凌菲霞博士生翻译。



尼库林教授首先介绍了“集体记忆”一词的生成。1925年，在其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中，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一词。该书的主要论点是，记忆主要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现象，个人只能在社会中记忆。哈布瓦赫的这种记忆学说可以追溯到柏格森与涂尔干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进路——柏格森强调内省与个体反思，涂尔干强调思想的社会性质。对二者

的批判使得哈布瓦赫得以在其记忆学说中设立个体与集体这两个极端，而特拉斯堡“年鉴”（《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组的影响则使得哈布瓦赫更侧重集体。

哈布瓦赫认为，个体记忆总是刻入集体记忆中，并且需要借助集体或群体的记忆而被理解。离开集体，个人无法进行记忆。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学说提出了两个论据：其一，梦是正在回忆的大脑的两种对立功能，在梦中大脑最远离社会，它不能唤起对事件或者复杂图景的回忆，因而记忆是社会的和集体的；其二，内省行为假定了内部与外部之区分，但事实上这种区分是错误的，因为它以孤立的个人为前提，而个人实际上是集体的。尼库林教授认为，哈布瓦赫的这两个论据并不充分而严肃。前者的缺点在于，即使梦杂乱无章、并缺乏清醒时的连贯性，但其来源却往往是人的社交活动；后者预设了结论，它只是以（记忆）经验的集体性为前提而证明自省是构建集体的方法。

按照哈布瓦赫的观点，记忆是在社会框架或社会情境中保存的。社会可以划分为许多集体，各个集体则趋向于通过自身的习俗、体制和传统以及集体共同运用和讲述的记忆来保存自我。这样，集体记忆就成了为特殊的社会框架所定义的群体记忆。个人由于从属于不同的集体而拥有不同的集体记忆，并且，不同的集体之间可以相互交流，这意味着集体记忆也可以被学习。由于集体记忆被特殊的社会框架所支撑，因此，一旦某个社会框架消失，集体记忆的关联性被打破，这一集体记忆就会成为历史。这样，历史就是与集体记忆相对立的。只有当集体记忆消失时，历史才会形成。然而，哈布瓦赫排除了较小社会团体形成历史记忆的可能性。他认为，只有最大的集体——民族——才有形成历史记忆的可能性。但是，历史具有强烈的史料编纂特性，他所依据的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未来目标。

与记忆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遗忘，遗忘同样与集体相关，它是记忆与集体的分离。在哈布瓦赫看来，事实上我们并不会遗忘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社会记忆中抹去。因为，我们能够根据社会记忆重建过去。由此，这涉及了另一个问题——回忆。哈布

瓦赫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回忆获知过去的每一个事实和行为，它不是对过去事物的复制，而是积极的重建。“根据集体当前的观点和关切，关于过去的记忆在不断地修改且常常被新记忆所取代。因而，作为重建性回忆的集体记忆总是一个重拾共有过去意义的一个创造性过程。”¹在此，哈布瓦赫并未有意识地区分记忆与回忆。因而，在对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学说进行了充分的介绍和批判之后，尼库林教授在报告结尾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集体回忆 (Collective Recollection)。



“集体回忆是与他人一起以合理的方式精心重建过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寻找过去、理解过去并评价过去。尼库林教授认为，集体回忆应当具有四个特点。其一，集体记忆通常偏向当时的政治方针；集体回忆则应该是批判性的，它允许以公开、互惠、透明为标准对起源和起点进行讨论。其二，集体性回忆是参与

¹ 参见德米德里·尼库林著、凌菲霞译、周宏胤校《集体记忆与集体回忆》。如未加注释，本期《工作简报》中的其它引文均引自简报条目对应文章。

性的，它向所有人开放，因而是潜在民主的。其三，集体回忆以公共推理为前提，这一前提可以被合理质疑。其四，集体回忆是建设性和重构性的，它是一个过程(process)，而非行为(act)。

马天俊教授认为，关于记忆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范式，其一侧重个人，其二偏于集体。一般而言，我们是从个体出发来理解群体。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地位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和哲学思想中都变得非常突出。这种解释范式把个人看做根源，而群体只是它的一种效应。另一种解释范式则是从社会群体出发来诠释个体，它可以被名之为“socialism”，对应的中文译名可以是伙伴论、集体论或者社群

主义等。这种解释范式把社会或者共同体看做原初现实，而个体只是其中的成分。在这一路向上，哈布瓦赫和尼库林都是从群体、从社会来诠释个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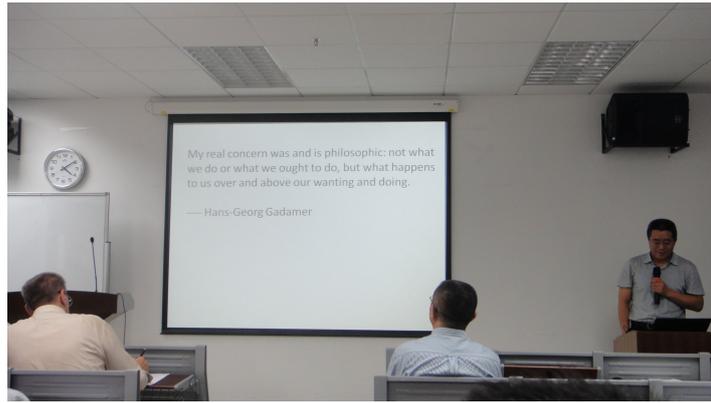
针对尼库林教授所提出的集体回忆的概念，马天俊教授认为，一旦有了这样的概念，作为过去的参与者，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就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要随着当下的处境和问题意识而不断地被调整。这种不断的调整，需要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参与，因而，这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意味着一份不轻的责任。并且，我们的回忆建构，也并非是关于个人的无趣往事，而是意义重大、比较严肃的集体回忆。

精彩互动

马天俊：你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对哈布瓦赫关于记忆都是集体的这一说法所给出的两个论据进行了批评，认为哈布瓦赫的梦的论据不太有效，理由是我们无法排除一种情况——即使我们的梦是杂乱无章的，他仍然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活动。但是，哈布瓦赫并未否定梦的内容的社会性，而只是说它杂乱无章。因此，用这一理由来说哈布瓦赫的讨论不太有效，显得有些文不对题。

集体回忆是你这篇文章的重点，我想举几个例子，讨论一下我们的集体回忆是什么样的。其一，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里讲淮阴侯韩信，并没有提韩信的父母是谁，而只是说韩信起初“贫无行”，而这个故事在结尾，事实上又回到了“贫无行”这一点上。其二，建国后曾有一段时间把毛刘周朱陈林邓并称为七大领袖，现在这已经是我们所不那么不熟悉的历史。其三，“文革”期间搞批斗，批斗者要带着高帽子跪在台上接受批斗，这同样已经是比较陌生的场景。对于历史来说，有些东西是永远消失了，但有些东西只不过是暂时没有到前台来，没有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积极因素。我们往往不会拿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出来，但是不拿出来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一定是有选择性的，而我们今天，还可以对历史不断地改写。但是，我们需要搞清楚，改写历史的目的是何在？——每当我们改写历史的时候，一定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提出了某种要求。因此，集体回忆是不是一次就完成了？恐怕永远都不是。

我们在哲学上倡导反观、内省，但是究竟怎么才能往回看？怎么才能反省？或者说，回忆何以是可能的？事实上，在没有社会和语言的情况下，单个的人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个人的内省是以社会为条件，以语言为中介的。人作为一种说话的造物，拥有语言，而语言一定是社会性的。私人语言并不存在。因此，集体的回忆，也一定是社会的事物。它是一种社会性的言说，可以被看做是集体性的事业。中文里讲“修”“辞”，这意味着“辞”是要“修”的。修辞就是做事情。因此，你所讲的集体记忆和集体回忆中，没有太注意或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但我认为，我们能做那么多高级的事情，一定是以公共语言为条件的。



尼库林：我在很多方面和你的意见是一致的。关于回忆的范式，我比较支持自由主义的观点。个人不应受集体的支配，被单纯地简化成一种关系，他不仅仅是各种社会机构的结果。我们应该在侧重个体和侧重群体之间寻找一种更加中性的解释范式。

我并没有想严肃地反对哈布瓦赫所提出的梦的论据。但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和梦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我看来，梦作为一种比较混乱的记忆，不足以用来支撑集体记忆。从社会层面上来说，梦是非常有激发性的，它能够促使我们思考，但我不认同哈布瓦赫所说的梦和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

关于“文革”的例子可以引出另一主题——创伤。回忆在很多时候是与创伤有关的，而创伤的特性则在于使人感到压迫并倾向于遗忘。这是一种记忆机制。但在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回到我们的记忆中去。我提起的这种回忆理论是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比如，斯大林就曾经把他的一个对手从纪念碑上消除掉。有一种以弗洛伊德心理学说为依据的创伤理论认为，我们虽然不能充分地认识创伤，但是却可以努力地对它进行回忆。尽管创伤是痛苦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将其排除在我们的记忆之外。回忆创伤的意义在于，通过一种公开的、民主的讨论，而避免灾难性事件的重演。

邓伟生：你归纳了哈布瓦赫的两个论证，并提出了两个批评。如果这两个批评成立，哈布瓦赫的理论就是错的。但是，你接下来的观点实际上是基于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的。如果这样的话，你的理论基础就不是那么牢固。

尼库林：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论述，基础不太牢固。按照他的观点，一个人小时候在一个集体中，长大后离开了这一集体，其记忆就会改变。我认为，记忆的改变是有条件的。如果接受集体记忆的概念，就不需要去推翻哈布瓦赫的观

点，而我这里并不赞同哈布瓦赫的观点。

中大学生：八年抗战，应该用集体记忆还是集体回忆？或者是个人记忆和个人回忆？

尼库林：不同的群体由于其立场不同，对待创伤事件的方式并不相同。我个人认为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我们的集体回忆应该在公开的、参与性的环境下展开。对创伤的回忆，应该基于良好的政治意愿。回忆创伤事件，是一种道德义务。因此哪怕它意味着痛苦，但是为了避免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集体回忆仍然是有必要的。关于战争的创伤，德国处理得就比较好，他们有勇气用公开的、批判的态度去进行回忆；相比之下，现在也有国家否认其历史行为。可取的做法是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进行回忆，以此避免灾难事件的再次发生。



温宁：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梦本来是一个个的，但是也可以组合成为一个集体的梦想，比如美国梦、中国梦。如果创伤也可以组合的话，那么这种组合应该是什么样的？第二，集体回忆有一种集体的形式，这种集体形式是具有普遍性的，还是根据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

尼库林：我文章里讲的梦和你所说的梦并不相同，我所指的梦是说人的睡眠状态，而并不是集体对未来的展望和预期。对哈布瓦赫提到的集体记忆，我本人持有异议。集体记忆是集体把它的意愿强加到个人身上，我更倾向于个人能公开、自由地参与到集体回忆中。记忆是一个行为，回忆是一个过程。它并不保证一定能有所收获，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共同努力。

中大学生：刘小枫教授在他的一篇近作中认为，对毛泽东的分裂性评价导致了中国的宪政危机。那么，集体记忆会不会真的因为对一个领袖的分裂性评价而

导致一个国家的现实危机？

尼库林：我不太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我所熟悉的领域。我们的记忆有错误的记忆和批判性的记忆等区分，它很可能被不同立场的人和权力机构所利用，并将之当做一个话题展开。我们的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记忆方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的变换而有不同的面貌。重要之处仍然在于，采用一种更加公开的方式去编纂历史。

（刘晓雷）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2期综述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2期于2016年6月17日在锡昌堂420室举行，本期研习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软实力——以苏联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为例说”，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徐长福教授主讲、马天俊教授主持、陈长安博士评论。

徐长福教授首先考察了“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原初含义。他指出，由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实力”这一概念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概念；其二，它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吸引力，它还包括政治理念和政策。因此，尽管中文常常将“软实力”这个概念与“文化”一词相连用，但是，“国家软实力”这一概念其实更符合“软实力”的原初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国家软实力，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完备性学说，“既是一种理论形态的文化，也蕴含着一套政治理念，还支撑着许多政策主张，从而兼备国家软实力所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尽管马克思不把自己的学说当做民族国家的软实力，而宣称其思想是为全人类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的。但是马克思

主义在其创始人那里，事实上与国家软实力具有相关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软实力经历了东移与西归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到十月革命之前的这段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始终主导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产生了分歧，进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德国继承者和俄国追随者之间的较量。马克思主义正式具有了国家软实力的特征。而在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软实力也被发挥到了极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软实力之强盛，主要体现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编纂、出版以及学术研究和理论争鸣的活跃性上。但是，苏联随后的高度集权模式，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政治化。失去了理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之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日趋丧失其国际吸引力，最终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取代。



徐长福教授通过考察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搜集、编纂、翻译和出版情况，具体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东移和西归过程。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所出版的著作，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梅林、考茨基、伯恩斯坦和倍倍尔等人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所塑造的。但是，1917年由梁赞诺夫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962）》使俄国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搜集、编纂、翻译和出版方面开始后来居上。随后在1918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即决定出版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0年底，俄共（布）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博物馆，1921年初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梁赞诺夫被任命为院长。列宁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搜集、编纂、翻译和出版工作始终非常支持。而在梁赞诺夫的努力下，最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流入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从1927年到19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历史考证版共出版了12卷（13册）；从1928年到19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共出版29卷（34册）。”苏联后期，1950年启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纂工作则使得苏联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编纂、翻译和出版达到了顶峰。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编纂工作的启动，相关主导权开始落到民主德国手中，苏联剧变后更完全由西方国家机构来掌握。

徐长福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他们生前出版的文献来塑造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包括部分未刊手稿，来塑造的；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由苏联出版的各个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新旧《马克思恩格斯文库》来塑造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全集》俄文第二版；二十世纪末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全集》德文版和历史考证版第二版来塑造的；不用说，今后的马克思主义将主要由正在出版的《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来塑造。”他指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是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是把马克思主

义转化为国家软实力的基础。”但是，“文献出版一方面支撑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又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在本质上是文献、理论与实践相协同的综合实力，这就要求三者之间要有良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经验和教训都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出版为德波林在理论上战胜机械论者提供了文献支撑，但是，与实践相脱节的德波林却在与米丁等人的论战中被以政治决议的方式打倒。

在德波林之后，“斯大林构建起了无所不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且把这个体系推广到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徐长福教授对此总结认为，“苏联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可以依仗硬实力灌输给国内民众，也可以靠软实力上的相对优势影响到一些落后国家，但由于其软实力毕竟难敌西方，因而最终不仅无法吸引并赢得西方国家的人心，反而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失掉了本国的人心。就此而言，斯大林所推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化虽

然在短期内方便了国内统治，但长期来看却对作为苏联国家软实力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致命的伤害。”



陈长安博士评论认为，徐长福教授的报告具有两层新意。其一，尽管苏联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我国目前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已经越来越少了。对苏联出版的马恩文献进行梳理，有助于重新引起学界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其二，我们对软实力的一般理解往往是“文化软实力”，将苏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软实力相联系，这样的研究也是一种创新。同时，他指出该文章的问题在于过于侧重文献编纂、出版等方面的梳理，而实际上，单纯的文献还与马克思主义软实力存在差距，因为它还涉及理论和实践的作用。

精彩互动

陈长安：这篇文章对文献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但是，文中涉及的所有文献都是翻译过来的中文文献，而没有第一手文献，这是文章的一个缺憾。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应该至少从德语、英语、俄语、日语这四种外文中选学两种，以便在研究中可以勘照第一手文献。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原始的文献就是其手稿。现在马克思的手稿已经电子化了，我们完全可以尝试对马克思的字迹进行辨认。方法就是通过对照已经编辑的文本和马克思的手稿，逐渐总结其书写特征。我在自己的课堂上已经做过尝试，并成功地辨认了一封马克思用英文写作的书信。

江璐：在手稿已经编辑出来之后，对照编辑文本辨认手稿相对比较容易。但如果直接辨认马克思的手稿，并且进行编辑，这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训练手稿辨认能力当然可以，但是这种训练需要是专门性的。既然编辑专家已经将手稿编辑了出来，研究者在研究中还要再去接受手稿辨认的训练，这就有点得不偿失。

徐长福：对于不同的学术行当，有不同的学术标准。我的文章受限于写作意图，对文献的梳理到这个程度已经足够了。我反而想回应一点，就是语言对于真正做文献的人来说的重要性。我在研究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如果赵玉兰和姚颖是一个人就好了。这两个人，赵玉兰会德语，姚颖会俄语，赵玉兰在她的研究中写苏联部分的时候，还要再引用姚颖的文章。这样一结合，她就可以直接接触第一手文献。做马克思主义研究，单纯依赖中文是不行的。我现在的研究比较依赖英文。但中文可以作为拐杖，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拐杖走到原文。



马天俊：软实力其实有一个作用机制。现在英语的软实力很强大，我们研究

中的许多重要概念——比如“软实力”——都是由英语作家提出的。在国家软实力方面，苏联也曾经相当厉害。我举四个例子：

1、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里有一章讲马克思。我当年读的时候，总觉得他对马克思讲得不到家。罗素在谈马克思时，讲的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他对唯物主义批评了一通，而把这笔账算在了马克思头上。现在看来，我们可能觉得这么做不大合适，会认为罗素所讲的不是马克思。但是在罗素写作《西方哲学史》的那个年代，他显然已经认为，苏联人所讲的马克思，就是真正的马克思。

2、有一位天主教作家维特尔，写了一部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他的用意是站在托马斯主义的立场上批评辩证唯物主义，而他所批评的这一版本的马克思，也是苏联在30年代塑造出来的。这也意味着对于他来说，苏联就可以代表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只要找苏联就可以了。

3、阿尔都塞在讲“认识论断裂”等问题的时候，心里也有一个靶子——他也是以苏联塑造的马克思主义为标准的。

4、刘丹岩先生也曾经认为，搞马克思主义研究，只要把苏联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拿来批判就可以了。

我们曾经学苏联，到现在痕迹还很深。今天我们的研究，离不开英语的语境。甚至于有的博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随便找个人出来，就能做博士论文。这就是软实力的效应，这种效应将来也会留下很深的痕迹。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不住地声讨柏格森、胡塞尔、弗洛伊德等人，这说明他们清楚英语学界的人乃是其论争对手。五十年代，苏联教科书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因此，到了中文著作中，对于英语学界的这些人，都是三言五语带过去，或者置换为中国人所熟悉的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等人。这其实可以反映出来，我们现在还是有选择的，选择的余地就是哪些文献变得更加重要。

把文献拿在手里，对于理论的建设，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我们今天有学者意识到其重要性，已经很难能可贵了。我们编辑第一版马恩全集的时候，完全是依据俄文版转译的，并且认为这样也就够了。现在在文献编纂上，王明还没有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研究更是另一回事。因此，中国的学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做到国际顶级，无论是在文献还是理论上，应该说路都还很长。

卢家银：苏联建国时很弱小，马克思主义被他们视为一个工具，他们需要这

一工具的正确性。苏联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苏联当时在一元体制下，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它的国家软实力，使之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西方。并且，苏联可以一直掌握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解释权，原因又何在？现在，我们中国的体制和当年的苏联十分相似。那么，我们能不能再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提升我们的国家软实力，使其成为一个主导性话语，产生国际性的震撼性影响呢？

徐长福：马老师的话使我想到了波普对马克思的批判，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从文献上对波普做一个反批判。波普当时批判马克思，依据的都是在奥地利比较流行的一些说法，还不是专业的马克思原著。我们对其文献依据进行考察和批评，就能从中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和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英文版的马恩全集直到70年代才出版，之前都是些零星的翻译，而这一点则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

另外，苏联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是很高的。苏联当年能够和美国并驾齐驱、竞争较量，乃是以其科学水平和学术水平为基础和前提的。苏联教科书的编撰者，都有很深厚的学养。他们直接以西方作家为对手，我们则连那些对手都还不了解，并且做事情还不认真，因此还差得很远。所以，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里面，苏联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但是，当年苏联搞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德国也是看不起苏联人的。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软实力整体上呈现的是阶梯式衰减。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最低的，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体制和传统不同，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掌权了也未必重视文献编撰工作。德国当年就不重视文献编撰，苏联重视，而中国也是不重视。中国的所有人力、物力、财力都是为当下服务的。所以，人再多、钱再多、机构再多都没有用。因为区分度不够——全部用来做一件事情，而没有形成一个生产线。我们没有追求科学知识的传统，所以即使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却在西方。

江璐：我再回应一下长安的观点。我认为搞文献需要有一个耐得住寂寞的精神。其实研究还是需要分工合作——搞文献和搞义理要分工。专门搞编辑的人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了，搞义理的人没必要再回头重新搞一遍文献。尤其是对于学说推广来说，如果只靠原文，肯定是不够的，一定要确定一个权威的翻译版本。

比如用研究康德，用英文文献的话，只要用剑桥的版本就可以了。

徐长福：这是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处于一个不够发达的阶段，处于做学问的初期，所以才会有重复劳动。在一个发达的学术体系中，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哪个环节上工作，知道自己在大的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因此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陈长安：我同意江老师和徐老师的观点，成熟的学术是有分工的，健全的学术布局也需要研究者各司其职。但是，当没有权威译文时，则需要查阅原文作为辅助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去做编辑研究。



周宏胤：这篇文章的最后落脚点是是不是就是马克思主义要非政治化，才能增强国家软实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列宁的那种政治化是可取的，而只是不要斯大林的做法。

徐长福：列宁时期，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或者政治事务方面都比较开明，但是为时较短。斯大林的做法则显然与列宁不一样。从字义来看，列宁是有政治性，斯大林则是政治化。政治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但是政治化就会很成问题。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化正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失去活力的原因。

林育川：如果回到马克思本人的语境，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思想揭示出来，其思想的软实力如何？您是否对他的思想抱有希望？比如，它在与自由主义的竞争中，大概会是怎样的一种态势？

徐长福：我本来不想过多地谈国家软实力，马克思的志向也不在于此。马克

思主义本身不是国家的工具，而是人类的福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软实力是不需要我们操心的，需要操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软实力的应用，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国家软实力的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自身的软实力。至于马克思的软实力，概括起来就是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会存在一天。

（刘晓雷）

◆学术成果◆

中心主任徐长福在《基督教思想评论》上发表论文

中心主任徐长福在第二十一辑《基督教思想评论》上发表题为《恩格斯对基督教的认识初探——研究现状与若干问题》的论文。该文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的认识不仅广泛影响着一般民众对基督教的看法与态度，而且决定着国家对基督教的方针与政策。”而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作家中，只有后者撰写过关于基督教的专题文章，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是，国内学界对恩格斯关于基督教的专题文章的研究程度却相当滞后。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既有新材料、又有分析和批评。相比之下，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总体上是在进行概括、疏解和称颂，而非学术研究。并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该问题的研究没有新意，专门的基督教研究者又对该问题不感兴趣。这使得“国内学界对恩格斯的相关研究既落后于国外同行，又滞后于生活实际。”

接着，该文指出了恩格斯对基督教的几个主要事实判断，即基督教的教义来源于裴洛和塞涅卡；使徒书信抄袭塞涅卡；基督教是群众创造的；《启示录》是新约中成书年代最早、写作时间最确定的一篇；《启示录》中数字“666”指的是尼禄。

最后，该文认为，国内学界在新材料、新观点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单纯重复恩格斯基于19世纪早期德国的研究成果所作出的事实判断，将之视为恒真命题，这是说不过去的。“在提出事实判断的问题之后，进一步提出价值判断的问题，乃至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并推动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才是更加重要的工作。”

（刘晓雷）

中心成员杨玉昌成果简讯

1.在《现代哲学》上发表论文

中心成员杨玉昌在 2016 年第 3 期《现代哲学》上发表题为“人的觉醒、迷失与寻求——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人学意义研究”²的论文。该文对应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是如何使人觉醒的，人在觉醒后何以迷失了自己和人应如何重新找回自己这三个问题展开了三层论述。首先，叔本华把意志看做康德所谓的自在之物，从而消解了康德对于上帝的道德悬设，实质上用人取代了上帝。这意味着人推倒了上帝而获得完全的独立和觉醒，从此无神论成为可能，而人则成为了哲学的研究主题。其次，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将自在之物等同于意志在严格的认识论上不能成立；从身体是意志到世界是意志的这种由内向外的推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盲目的意志无法回答柏拉图的理念客体化其自身这一问题；否定意志作为人的真正目的与意志全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最后，叔本华的意志哲学摧毁了传统目的论却没有给人树立一个新的目的，这使得人丧失目的而迷失自己。尼采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也并未成功。

究竟如何才能能在觉醒的同时又不迷失自己呢？杨玉昌认为“人是十分复杂的，任何想从单一的角度如信仰、理性或意志出发来给人下定义都是不恰当的，只有正视人之谜的复杂和困难，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和不断求索的精神，才能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收获更多。”

2.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论文

中心成员杨玉昌在 2016 年第 5 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题为“叔本华对于理性与意志关系的探索及其意义”的论文。该文认为，叔本华通过解构物自体的概念而瓦解了康德哲学中理性对于意志的主宰地位。他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意志，从而直观认识也并非如康德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而是人类知识的源泉。但是，叔本华并未完全脱离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而是主张理性与意志相兼容。这表现在叔本华仍然沿用主体与客体、概念和直观的认识框架和他仍然肯定理性的价值等方面。叔本华既突破传统又保留传统的做法，使

² 该文及下文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3 年度一般项目“人的觉醒及其出路”（GD13CZX03）阶段性成果。

得他来到了现代性的门口却未曾跨入。事实上，他在现代性的入口即已认识到了现代性中的生存焦虑、虚无主义和人的物化等问题。叔本华使理性与意志相交融的做法意味着二者的关系未必是对立和冲突的，而可以是融合统一的。“果真如此，人类将继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和近代启蒙的‘光明’之后进一步走出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误区，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刘晓雷）

中心成员王兴赛成果简讯

1.在《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论文

中心成员王兴赛在 2016 年第 3 期《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题为“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³的论文。该文中认为，当前学界对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实践维度未给予足够重视。实际上，“哲学的实践性或政治性是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1839-1941）哲学的本质。”该文从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时的思想语境；马克思对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整体讨论，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具体讨论；马克思当时对哲学与现实关系问题的直接回应三个方面进行展开论证。最后，该文认为《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核心就是“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的研究预示了其后的实践哲学发展道路，他“一生思想的成就与局限均奠基于他在博士论文时期的实践哲学思想。”

2.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论文

中心成员王兴赛在 2016 年 8 月 31 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题为《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论宪制和立法权》的文章。该文认为，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对于宪制和立法权关系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这个根本差异即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

³ 该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13AZX003）的阶段成果。

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黑格尔区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以二者的分离与异质性为前提构思整个宪制以及宪制与立法权的关系。而马克思则主张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内在统一和同质性，希望实现全民参与国家事务。”

3.出版合作译著《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

中心成员王兴赛与武汉大学德国哲学博士朱学平合作出版了译著《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该书作者为以色列学者阿维纳瑞（Avineri S.），其研究目的是“通过全面考察黑格尔所有时期的各类著作，努力重建其政治哲学的发展。”⁴该书共 12 章，其中，王兴赛负责翻译的部分为第 5—12 章。在“译后记”中，朱学平认为，该书优点有三：其一，它是“英语世界难得一见的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黑格尔社会和政治哲学的著作”；其二，它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理解和把握相当准确、到位；其三，它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人的社会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朱学平认为，“黑格尔哲学传入我国，已经颇有时日，同时因为与马克思的关系，也相对比较幸运。然而，对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研究，我国学界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此书的翻译，或有助于国人对黑格尔政治哲学有一初步的整体印象。”

（刘晓雷）

⁴ 【以】阿维纳瑞著，朱学平、王兴赛译：《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 年，英文版序第 2 页。该文其他引文见本书“译后序”。